

中阿诗人探访深圳——

## 邂逅诗意湾区 触摸创新脉搏

□本报记者 刘鹏波

5月11日,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的诗人和特邀嘉宾走进创新之城广东深圳。大家走访华为总部、腾讯总部,参观“湾区之眼”、深圳湾文化广场与深圳人才公园,触摸深圳强劲的创新脉搏,感受这座山海之城的人文底蕴与生态之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何向阳,中国作协党组成员陈二厚出席活动。

## 一首科技写就的诗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及智能终端提供商,也是深圳科技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标杆,其总部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中阿诗人们漫步园区,感受华为以科创力量链接全球、赋能跨域产业合作的责任担当。展厅内冷色调灯光与智能车型的组合,营造出科幻大片般的沉浸式体验,“手势泊车”功能、“抬头显示”系统等先进技术让中阿诗人们深受震撼。一系列新款数码产品也凭借个性化设计和丰富功能,吸引大家纷纷拍照记录。突尼斯诗人安瓦尔·本·侯赛因亲身体验了华为的智能汽车,先进的“黑科技”让他由衷赞叹:“之前就听说中国因科技而闻名,今天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令人惊奇!”

腾讯总部坐落于深圳南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作为深圳的科技创新高地,腾讯始终深耕数字经济与互联网科技,旗下产品深度融入大众生活。在这里,中阿诗人们近距离感受互联网技术在民生服务、文化传播、产业升级、社会公益等领域的落地实践,亲身体验AI技术赋能的多项科技产品。展厅内,利用游戏引擎技术还原的莫高窟第285窟成为合影热点,逼真的场景还原让诗人们惊叹“仿佛穿越时空”。摩洛哥诗人阿伊莎·贝勒哈吉在直播设备前即兴扮演“带货主播”,幽默的互动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在叙利亚诗人玛纳赫勒·萨哈维看来,深圳如同一

首用科技写就的诗,“科技的创新之路就需要诗一般的灵感与思维,中国人正在用科技书写新的诗篇。当人们用写诗的心态畅想未来,便能创造出惊艳世人的科技成果”。

## 一座书籍搭建的城

超8400平方米阅读空间、30余万册图书……“湾区之眼”作为深圳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之一,已成为广受市民青睐的文化新地标。这座全球最大实体书城打破传统书店的业态边界,打造艺术花园、人文万象、欢乐META三大主题阅读空间,将阅读与艺术、科技、自然巧妙融合,让诗意渗透在每个角落。

步入书城内部,开阔恢宏的空间设计、琳琅满目的崭新书籍令中阿诗人们眼前一亮,大家不时驻足翻阅、交谈讨论。诗人们参观了“AI声音乌托邦”区域,体验从复古书房到未来空间的声音之旅。“智慧树”镜面装置通过四周整面反光镜墙与天花板几何结构,将人影无限反射,营造出梦幻的视觉效果。诗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平放于地面,通过延时拍摄定格美好瞬间,合影里满是青春的笑脸。

穿过“智慧树”,便来到坐落于湾区之眼屋顶的星空花园。这片融合生态种植与多功能活动的区域,为喧嚣的城市生活开辟了一处亲近自然的诗意场所。在标志性的“BOOK”logo前,中阿诗人并肩而立、合影留念,远眺城市风景,感受深圳蓬勃的发展生机,书香与诗意在此交融。海风扑面而来,绿意映入眼帘,深圳秀美的风景令人沉醉,“湾区之眼”让诗人们倍感惊喜,刷新了他们对书城的想象。

## 一方人才荟萃的湾

远远望去,深圳湾文化广场如同一颗颗石子自然

散落于深圳湾畔。诗人们先后参观了“Design100:设计·人·生活”“流传传承:中国设计叙事”“设计永恒:世界现代设计”“当代力量:中国/深圳设计探索”等展览,在古今中外的设计作品中探寻设计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密码。“整个建筑空间很宏大、很舒服。”苏丹诗人希蕊对深圳湾文化广场赞不绝口。她特意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拍摄的应县木塔模型照片,“中国传统建筑充满智慧,比如结合气候设计可以产生冬暖夏凉的效果,这与苏丹传统建筑的理念不谋而合”。此外,展览中以悬挂方式展示的日用品也让她印象深刻。希蕊表示,展览通过数字化技术还原书法魅力、实现沉浸式体验,很好地实现了古代智慧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这样的古今对话意蕴深远。

行程最后一站,大家来到深圳人才公园,一湖一岸、四轴八景将人才元素与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巧妙融合。湖水澄澈、草木葱茏,滨海风光与人文底蕴融为一体,不禁让诗人们由衷感慨“景色真美,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相得益彰”。公园以“人才”命名,凸显了深圳对人才的重视,这一点极富远见。正是对人才的这份珍视,让深圳这座城市不断保持先进、蓬勃发展。来自摩洛哥的阿卜杜勒·迈赫迪德介绍说,摩洛哥也在大力推动人才培养,比如近年来开展丰富活动,助力青少年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对任何国家而言,青年与人才都是未来的希望,关乎国家的兴衰”。

此次深圳之行让阿拉伯国家诗人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城市的多元魅力,体悟到科技创新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在文化碰撞中更好激发创作灵感,中阿诗人们也在一次次互动交流中进一步增进了友谊。正如中国诗人贺子飞所言,创新已成为深圳独特的名片。诗歌作为跨越语言的艺术载体,在科技赋能下更能搭建心灵的桥梁,唤起情感的共鸣,有助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让青春的诗意回荡在山海之间。

(部分素材来源于南方+、深圳特区报·直新闻)

## 珠江雅韵,诗情流芳

(上接第1版)

## “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

当天下午,诗人们还登上广州塔,饱览全城美景。摩洛哥诗人苏凯娜·哈比卜拉雅雅激动心情,用“美到失语”形容所见所闻,站在塔顶,她好似身在云端,直言“已经词穷了”。在她看来,中国在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但广州城市建设的繁华程度仍然超出她的预期,让她深感震撼。同样激动不已的还有中国诗人苏越,他自小就在湾区长大,接受不同文化的浸润,其创作饱含对世界的多元认知。谈及此次诗会,他感触很深:“不同文明在广州这座城市连接碰撞、产生火花,对我今后的诗歌写作会有很大影响。尽管中阿诗人语言有别,但大家对诗歌的热爱是相同的。”

“每天都能结识新朋友,与那些有才华的诗人交流,这种感觉真的很棒。”不少首次来到中国的诗人告诉记者,广州的每个街区、每条街道都有独特的历史韵味。登上广州塔,俯瞰全城景色,可以更加深刻地读懂这座城市。他们表示,诗歌是与人交流的最佳方式,是开启对话的桥梁,让我们看到彼此真实的模样,以及理解事物的独特方式。“在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诗歌赋予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和谐,我们需要这样的和谐,需要这样的交流。”

## “你们是世界上最美的诗篇”

(上接第1版)

针对学生们在读诗、写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诗人们也给出了建议与寄语。“把写诗当作一生的修行,摒弃流行的眼光,回归朴素的视角看待世界。”中国诗人吕布回回答说,诗歌能够映照生命状态,坚持写诗,生活终将被诗歌重塑。她希望青年人保持求知欲和学习动力,让真诚的光亮照亮内心,在文字的修行中沉淀自我。中国诗人林丽筠谈到,诗歌是倾听内心、安放情绪的港湾,诗歌可容纳万般情绪,让人们在文字中与自我对话,寻得内心的安宁与从容。中国诗人熊曼认为,青年人身上葆有轻盈与纯粹,这也是诗歌最珍贵的品质。青年们要多贴近诗歌、坚持阅读、修炼诗心,诗歌“能为心灵松绑,为现实生活提供一个出口”。

在欣赏同学们精心准备的古筝重奏《倒垂帘》和原创歌曲《广外序章》后,叙利亚诗人奈斯琳·阿克拉

在与外国诗人的数天交往中,中国诗人苏奇飞同样感受到他们的友好和亲切,以及对中华文化、中国诗歌的好奇。他借助翻译软件与阿拉伯国家诗人深入交流创作现状、诗歌风格,发现当代阿拉伯国家青年诗人始终心系家国、聚焦民族命运,“这更新了我对阿拉伯诗歌的固有想象,给我很多惊喜。他们真的有开阔的世界文学眼光,积极了解中国古今诗歌作品”。

埃及诗人马拉卡·巴德尔表示,通过此次诗会接触到了很多中国诗人、作品,发现大家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都有相似之处,这让她对写作有了新的想法和思考,也期待今后会诞生新的表达。这一观点与中国诗人赵琳不谋而合。在赵琳看来,跨文化诗歌交流的核心在于打破诗人固有的惯性思维,不是只有语言相通才能进行交流。“每首诗歌的出现,都会带着最美好的诗意,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真诚而长久的见证。”通过此次诗会,他深切感受到,诗歌可以用来记录一切发生或未发生的事物,诗歌语言具有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的桥梁作用,其传承延续是历史的一部分。

从古代丝路的文明交融,到今日珠江畔的诗意相聚,中阿诗人在笔墨流转间缔结了深厚情谊。至此,2026国际青春诗会广州段活动圆满落幕。诗人们即将奔赴北京,续写诗意新篇,为文明交流互鉴留存更多美好的印记。

姆·胡里表示:“音乐是通用语言,诗歌更是连接人们的精神纽带。”诗歌的魅力在于无法被定义,却早已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没有诗歌,生活便会失去色彩与温度。这段以诗歌为媒介、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的经历弥足珍贵,让她心怀感恩。

活动最后,阿拉伯国家诗人代表与学生代表互赠写有各自喜爱诗句的留言卡,向彼此送去诚挚的祝愿。中国学生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阿拉伯国家诗人则写下“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诗篇”,文字间满是对青春的期许和对友谊的珍视。

诗歌是青春的火焰、心灵的告白。正如葛小月在致辞中所言:“今天这个充满诗意的舞台,不仅让大家领略跨越山河的文字之美,更在每一位青年心间播下友谊、智慧与创造的种子。”这场高校诗歌日对话,让诗意在文字的共鸣中定格为永恒的美好。



诗人们参观“湾区之眼”,在标志性logo前合影 杜佳摄



诗人们参观深圳湾文化广场 杜佳摄

## 理论探索

## 大文学观意味着美学上的多样性

□段从学

“文学”这个词语,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这也告诉我们,“文学”的历史,是人们基于一定的观念建构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与我们时代的“文学”观念相符合的对象被指认出来,成为“文学”的历史;与此同时,那些和我们的“文学”观念不一致的对象遭到排斥和遮蔽,成为“非文学”的历史。前者锁定内涵,后者守护外延,合力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范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提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见乔纳森·卡勒的《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这种裁决和认定当然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行为,而是以这个“特定的社会”的整体性深层观念为基础,并反过来维系对应的社会文化实践。这说明,这种美学判断和文化实践,同整体的社会思想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特定的时间里,人们对于“何为文学”的理解,往往受到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这种观念塑造了我们阅读和理解“文学”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美学感觉,决定了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说:“我们欧洲的文学理论,形成于诗歌占优势的时代,那时莎士比亚被视为野蛮人、蛮夷,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作品被看作是大众(和儿童)的消遣(轻松)读物。浪漫主义者(他们十分可观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空间和时间视野)实际上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在被奉为经典的文学及其体裁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希腊化、中世纪晚期、巴洛克早期这些时代里,都存在着大量的、可说是无处栖身的体裁(其中大多是小型体裁,但不仅是小型体裁)。”(见《拉伯雷研究》)这说明,在一段时间里,欧洲的“文学”观念是比较狭窄的,后来才将众多文体纳入进来。现代中国的“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比如,小说、戏曲等历史上长期受到忽略的体裁得到了承认,梁启超甚至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而散文、辞赋等体裁的地位则明显下降。

也正因此,历史上一直就有拓展“文学”观念、拓宽文学视野的呼声。首先是一种体裁之内的拓展。朱自清曾在《新诗的进步》一文里,联系历史上的“唐诗人派”与“宋诗人派”之争,对主张表现劳苦大众现实生

活的左翼诗歌与主张挖掘内心世界、表现微妙的情境的象征诗派之间的争论,提出调和意见,主张“将诗的定义放宽些,将两类兼容并包,放弃了正统观念”,消除没有意义的争论。朱自清“将诗的定义放宽些”的主张,是“一种文学体裁”之内的“扩大”。还有就是不同体裁之间的拓展。譬如,巴赫金关注的是欧洲传统“文学”观念对各种“小型体裁”的排斥,以及浪漫主义“文学”本身的“狭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各种文学”都能自由地发出声音,“各种文学”都能找到栖身之所,才是良性的文学生态。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到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就不能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来框定所有的文学。实际上,世界上各大文明体系都曾创造过非常悠久、无比丰富的文学遗产。利用这种“非西方”的“文学”经验,重绘全球“世界文学”地图,建立并守护一种具有包容性、多样性的文学生态,显然是我们今后需要开展的工作。只有“一种文学”,就没有真正的“世界文学”,甚至根本就没有文学。“各种文学”相互汇聚、相互影响,才能激发出文学的丰富性。

这让我想到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词语——大文学观。在我看来,大文学观不仅仅意味着文学边界的扩容,实际上更指向美学上的多样性。如前所述,一种“文学”观念的背后,往往蕴藏着一种美学机制。我们接受了这套观念,就有可能接受一整套的文学形式和美学情感的束缚与限制。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自身美学情感的狭隘性和排他性。正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当我们接受了单一的“文学”观念,就有可能丧失欣赏多种声音构成的“复调小说”的敏感,丧失感受民间文学的丰富性、怪诞性的美学能力。非此即彼,要么是光明战胜黑暗的喜剧,要么是黑暗杀死了光明的悲剧,变成了我们的美学趣味。

因此,谈论大文学观,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应该重建我们自身的美学感情,尝试理解多样的美感。它可能是悲壮的、雄浑的,也可能是细腻的、幽婉的,还可能是可怕的、荒诞的。最终,这会让我们的美学感情丰富起来,能够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富的现实经验。这一点,恐怕才是我们不仅谈论大文学观,而且能够将其付诸日常实践的一个有效入口。

(作者系云南大学教授)

## 书评

## 传统总是不断产生回响

——评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

□李聪聪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长期关注的课题。他在这一学术领域持续深耕,每有所得,便发为文章,正所谓“用力多者收功远”。他之前已推出《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两本著作,最近又以新著《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继续探讨这一命题。“复兴”“涅槃”“再生”既有意义上的相关性,也有侧重点的不同。其中,“复兴”是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目标和归宿,“涅槃”是中国文学传统努力适应新的文艺格局所必经的过程,“再生”则是旧传统与新时代遇合后的最新状态。概而言之,我们需要在新的文化格局下,激发传统的活力,开启新的文艺艺术创造。

近年来,《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流浪山小妖怪》等作品之所以在口碑和商业上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们让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符合新时代认知的表达。推而广之,大到文化产业的勃兴,小到文学研究的深化,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经典的“延传”与“重构”都至关重要。这是李遇春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中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他从一些具体的问题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再生进行了递进式且系统化的思考。

小说文体的演变和发展是该书关注的重点内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极具标识性的文体类型,“传奇”叙事的当代性及其转型经验值得深入探讨。以张贤亮知识分子传奇叙事为例,李遇春认为今天重读小说《绿化树》不应再拘泥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视角,而应当重新重视《绿化树》中的民族化倾向和本土化色彩,注意到张贤亮的创作中通中西、融汇古今的文学立场。这一崭新视角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绿化树》的文学史价值,探索新时代知识分子传奇叙事的新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刘醒龙等作家的小说中得到了体现。于是,李遇春以《重中国知识分子传奇的叙事传统——从《凤凰琴》到《天行者》》为题,对相关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经典的“重构”同等重要的,是经典的“延传”。李遇春在《新历史演义小说文体的生成》《如何赓续中华千年文脉》等文章中,结合多位作家的创作实践,探讨传统命题在当下的新变。譬如,《听漏》表面上是对青铜重器进行“知识考古”,实则是以

“文化考古”的方式拷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建构理想的文化人格。这是小说的精神姿态,也是论文的写作立场。同为楚人的作家和研究者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思考了文脉赓续的命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旧体诗词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古典诗词到现当代旧体诗词,这一文体的创作从未中断。如何继承传统的优良、开启崭新的创造是当代诗词创作者面临的课题。《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重点探讨了红色诗歌及其经典化问题。这里所说的“红色诗歌”,不仅包括红色新诗(歌谣),还包括红色旧体诗词,二者互相融合,共同绘制了中国红色诗歌图谱。若将其置于中国现当代诗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类似的研究多聚焦“启蒙与革命”“人民性与大众化”等话题。若将其置于新时代文学的场域之中,我们应该以更加多元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丰富的红色文学资源。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我们文学研究者如果再以“对立”而非“对话”的立场看待文学创作中的新与旧、雅与俗,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这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试图恢复当代文学史原生态图景时所具备的眼光,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在新时代得以再生的应有之义。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逾70多年,到了系统而深入地回顾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了。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学现场,恰当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趋近历史现场,另一方面又有助于推进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建构。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中,李遇春提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性”与“历史性”两种研究范式之争此起彼伏。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这是摆在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问题”。对此,李遇春选择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提出应当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因为只有以此为前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我们才能更好地阐释新时代的文学实践。正是在上述方法的指引下,他提出,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彰显出一种新的人民美学形态。这显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已确立的当代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回响。

(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